

武装冲突与妇女赋权

——基于两项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陈 冲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武装冲突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影响。既有研究发现，武装冲突对女性造成了远超男性的伤害，但也为女性政治赋权创造了机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妇女的政治参与。然而，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宏观的国家层面，缺乏微观层次上对武装冲突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关注。同时，由于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观察数据，难以准确评估武装冲突对妇女赋权的因果影响。2008年马里共和国和2012年尼日利亚分别爆发了武装袭击事件，而这两起武装袭击爆发的时机碰巧与“非洲晴雨表”正在两国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问卷调查的时间相吻合。利用这一特征可以构建两项自然实验，探究武装冲突在微观层次上对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因果影响。统计分析发现，武装冲突在短期内显著地增加了受访者对于政府处理妇女赋权议题的不满程度，增强了民众对于本国妇女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感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行提升妇女赋权的政策改革提供了社会支持基础。在微观层次上厘清冲突对于妇女赋权进程的影响，为连接宏观跨国层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关键词】武装冲突；妇女赋权；自然实验；因果推断；非洲晴雨表

【作者简介】陈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邮编：100084）。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21.04.005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21）04-0103-29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应用大数据技术预测全球突发重大危机事件引发的社会骚乱研究”（项目批准号：20CGJ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复制本文研究的数据代码以及附录图表可在作者的个人页和Harvard Dataverse (<https://doi.org/10.7910/DVN/SQZAQF>) 获取。

一 导论

2020 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25 周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 (2000) 号决议通过 20 周年。作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 (women's empowerment) 是推动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① 过去 25 年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性别平等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与歧视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妇女和女童更容易成为武装暴力的受害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指出，“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② 鉴于妇女对预防冲突、维持和平、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具有积极的贡献，^③ 落实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也逐渐成为广泛的共识，^④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⑤ 在这一精神和目标的指引下，近年来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包括实证探究性别（不）平等与冲突的关系，并系统评估战争与冲突如何影响妇女的生活、就业、教育和家庭，尤其

① 《目标 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gender-equality>，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会交替使用“妇女赋权”与“女性赋权”二词。

②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2020 年 10 月 1 日。

③ 《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网站，<https://peacekeeping.un.org/zh/promoting-women-peace-and-security>；李英桃、金岳嶷：《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 号决议的发展与执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2 期，第 36-59 页。在联合国安理会 1325 号决议中，明确“认识到了解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作出有效的体制安排保证她们得到保护并充分参与和平进程，能大大有助于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原文参考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0/720/17/PDF/N0072017.pdf?OpenElement>。

④ 《女性赋权》，联合国网站，<https://news.un.org/zh/tags/nu-xing-fu-quan>。

⑤ 李英桃：《构建性别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原则与路径的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第 11-14 页；李英桃：《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推进性别平等——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3 届会议综论》，载《妇女研究论丛》2019 年第 3 期，第 106-114 页；李英桃：《安全视域下的性别议题与性别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5 期，第 44-49 页；温尧、谢蒙莹、陈冲：《“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2 期，第 134-154 页。

是政治权利，思考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地防止冲突与暴力的复发。

这些研究发现，性别权力越是平等，并且女性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越得到充分保护的國家，卷入到国际国内冲突的概率就越低；而那些冲突与战争频发的國家，在性别权力平等上也相对表现更差。^①基于此，这些研究开始在冲突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学研究中设定“性别平等—冲突关联”的新研究议程。^②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开始思考冲突与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的逆向因果关系，即冲突是否（以及如何）塑造性别权力的不平等。^③如果性别权力能够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那么以往研究发现的“性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和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一方面，战争爆发本身就可能導致性别权力更加失衡，其中的因果机制包括战争造成的军事化社会和崇尚英雄主义等；^④另一方面，战争和冲突也在客观上为妇女赋权提供了机会，甚至妇女的政治地位在战后得到大规模提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大力推进男女平等和妇女保护，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制定和推广《婚姻法》，女性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⑤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和解释冲突与暴力对妇女赋权和政治地位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议程。

① Erik Melander, “Gender Equality and Intrastate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695-714; Reed Wood and Jakana L Thomas, “Women on the Frontline: Rebel Group Ideology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olent Rebell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1, 2017, pp. 31-46.

② 基于女性主义假设进行定量研究“性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的先河，参见 Mary Caprioli, “Gendere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7, No. 1, 2000, pp. 53-68.

③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Helen O’Connell,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 in Conflict-affected and Fragile States? Insights from a Review of Evidence,” *Gender & Development*, Vol. 19, No. 3, 2011, pp. 455-466.

④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Kaitlyn Webster, Priscilla Torres,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Ethnic and Gender Hierarchies in the Crucible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20, pp. 710-722.

⑤ 游五岳、姚洋：《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 1950-2000 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66-89 页；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跨国观察数据（observational data），发现的相关关系难以进一步校正为因果关系。^①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宏观层次上的跨国比较，关注的是冲突的中长期效应，^②而对于冲突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缺乏研究，对于促进或阻碍妇女赋权的微观机制知之甚少。鉴于此，本文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从微观层次探究国内武装冲突如何影响社会对于增进妇女赋权的支持，尤其是在短期内的支持。

回答这一问题对于妇女赋权运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妇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从微观基础上厘清战争和冲突影响妇女赋权的机制，是探求“性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的关键一环。妇女赋权不仅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层面的支持，只有真正在全社会建立妇女赋权的支持基础和规范，有利于巩固妇女赋权的相关政策才会持续发挥效果，才能真正打破性别等级。因此，探究微观层面武装冲突如何影响社会成员对妇女赋权的态度和支持，将弥补既有研究过于关注宏观因素的不足，在理论上提供关于妇女赋权的新知识。其次，微观层次的社会成员的支持对于推进具体的性别平等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均需要对冲突后（战后）国家社会层面上的支持基础进行探究。性别等级是一项根植于社会的关于男女权力与从属的等级，在微观的社会层面理解社会成员如何看待政府在武装冲突前后对待妇女赋权政策，将为我们在政策实践上推动妇女赋权提供社会微观层面的理解。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社会对待妇女赋权的态度存在差异性，理解微观层面的差异，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妇女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针对上述挑战和困难，本文运用两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来评估武装冲突对于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探究在微观层次和短期内武装冲突影响妇女赋权社会支持基础的因果关系。自然实验方法的运用可以克服跨国观察数据无法很好地处理选择偏差和内生性的难题，为在微观层次上评估因果关

^① Erik Melander, “Gender Equality and Intrastate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695-714; Erik Melander, “Political Gender Equality and State Human Rights Abu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2, 2005, pp. 149-166.

^②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Reed Wood and Mark D. Ramirez, “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Gender Equality Peace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 3, 2018, pp. 345-367.

系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同时，本文聚焦于国内冲突和社会支持基础，这是推动妇女赋权的核心一环。具体而言，本文以发生在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的两起武装袭击事件为背景，利用自然实验设计的思路来评估政治暴力与妇女赋权支持的因果关系。这两项自然实验的共同思路是，利用武装袭击发生时两国在进行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这一事实，将武装袭击的爆发视为一项“外部冲击”（exogenous shock），冲突发生之前接受采访的受访者视为“控制组”（也称“对照组”），而冲突发生之后填写调查问卷的受访者由于已经接受了武装袭击相关的信息而被视为“干预组”（也称“实验组”），从而构建了一个自然实验去比较不同组的民众对于妇女赋权的支持态度变化。这种设计将使我们能够从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的角度研究关于政治暴力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两个自然实验聚焦于不同时段的两个国家，主要研究发现高度一致，这提升了研究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统计分析发现，武装袭击显著增加了民众对现任政府处理妇女赋权政策的不满，增强了民众关于本国妇女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感知，武装袭击导致的这些不满随着有关武装袭击事件的新闻在全国的传播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显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提升妇女赋权的政策改革提供了社会支持基础。这一发现，补充了既有研究关于国家层次上的国内冲突在长期内会促进性别权力的平等这一知识。^① 本文在微观层次的分析以及利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加入了新近兴起的通过实验、尤其是问卷实验研究国内冲突和政治暴力的浪潮，^② 为我们将宏观层次的理论观点诉诸微观层次的经验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建立了沟通微观和宏观层次上“性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的桥梁。

二 冲突、和平与性别平等

冲突、和平与性别（不）平等之间有何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2000）号决议在认定武装冲突对妇女造成严重和独特影响的同时，也强调了她们作为和

^① Kaitlyn Webster, Priscilla Torres,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Ethnic and Gender Hierarchies in the Crucible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20, pp. 710-722.

^② Laia Balcells and Gerard Torrats-Espinosa,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t Attac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5, No. 42, 2018, pp. 10624-10629; Karin Dyrstad and Solveig Hillesund, “Explaining Support for Political Violence: Grievance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4, No. 9, 2020, pp. 1724-1753.

平与安全的积极推动力量，在平等、充分参与和平与安全进程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①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此进行了丰富的论述，其核心论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性别权力等级比较平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总体上经历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的概率也会显著降低。^②

埃里克·梅兰德（Erik Melander）更进一步地总结和检验了为何性别平等的社会更不太可能经历冲突的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性别更平等的社会更可能维持和平，是因为妇女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发言权，而妇女通常更不喜欢战争。第二种观点认为，性别更平等的社会更和平，可能是因为那些定义男女之间平等关系以及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的规范通常也被延续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因此诸如少数群体、派别或政治对手的意见或不满（grievance）更能够得到有效的沟通和解决。^③ 梅兰德利用议会中女性任职比例以及 25 岁以上女性相较于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比例来衡量性别平等程度，发现二者与国内冲突爆发概率的降低具有显著关系。近年来，在梅兰德的研究基础上，学界对于性别平等与冲突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首先，学界关注性别（不）平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冲突的发生、过程和结果。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形成经验共识，即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性别权力越是平等，该社会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低。^④ 研究也发现，女性参与冲突与和平进程也会显著地影响冲突过程和结果。^⑤ 例如，西奥多拉·伊斯

① 《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网站，<https://peacekeeping.un.org/zh/promoting-women-peace-and-security>。

② 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ry Caprioli, "Gendere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7, No. 1, 2000, pp. 53-68.

③ Erik Melander, "Gender Equality and Intrastate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695-714.

④ Mary Caprioli, "Gendere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7, No. 1, 2000, pp. 51-68; Mary Caprioli and Mark A. Boyer, "Gender, Vio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4, 2001, pp. 503-518; Reed Wood and Jakana L Thomas, "Women on the Frontline: Rebel Group Ideology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olent Rebell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1, 2017, pp. 31-46.

⑤ Alex Braithwaite and Luna B Ruiz, "Female Combatants, Forced Recruitment, and Civil Conflict Outcomes," *Research & Politics*, Vol. 5, No. 2, 2018, pp. 1-7; Dara Kay Cohen, "Female Combatants and the Perpetration of Violence: Wartime Rape in the Sierra Leone Civil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5, No. 3, 2013, pp. 383-415; Devorah Manekin and Reed M Wood, "Framing the Narrative: Female Fighters, External Audience Attitudes, and Transnational Support for Armed Rebell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4, No. 9, 2020, pp. 1638-1665.

梅内·吉泽利斯 (Theodora-Ismene Gizelis) 和萨布丽娜·卡里姆 (Sabrina Karim) 等学者分别研究了女性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发现增加女性在维和部队中的比例能够显著提升维和效果。^① 贾卡纳·托马斯 (Jakana L. Thomas) 和凯尼莎·邦德 (Kanisha Bond) 通过研究 19 个非洲国家 1950~2011 年的 166 个暴力政治团体的妇女参与情况, 发现妇女参与武装组织主要是因为她们被武装组织能够提供给女性的政治参与机会吸引。^②

其次, 最近一些研究也开始指出, “性别—冲突关联”存在着逆向因果关系, 即冲突和战争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国内女性的赋权和政治参与, 尤其是可能为女性的政治参与和民权提升提供空间和机会。例如, 凯特琳·韦伯斯特 (Kaitlyn Webster) 等人的研究表明, 经历国际国内冲突的国家在中短期内更有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参与度, 因为战争和冲突打破了固有的不利于提升妇女权力的社会结构, 并且提供的新工作机会以及带来的政治制度改革都有利于提升女性政治权力。^③ 这些研究开始关注冲突之后妇女的权力发展问题,^④ 尤其是社会和女性团体如何利用冲突创造的机会之窗推动妇女赋权进程。^⑤

然而, 关于冲突和暴力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微观层次上的研究依然缺乏。尽管在宏观上, 研究者梳理和检验了冲突与和平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机制, 以及冲突的结果如何影响性别权力结构的变化, 但是这些机制依然缺乏微观层次上的经验证

① Theodora-Ismene Gizelis, “Gender Empowerment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building,”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6, No. 4, 2009, pp. 505-523; Sabrina Karim and Kyle Beardsley, *Equal Opportunity Peacekeeping: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Post-Conflict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Jakana L Thomas and Kanisha D Bo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ol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9, No. 3, 2015, pp. 488-506.

③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Kaitlyn Webster, Priscilla Torres,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Ethnic and Gender Hierarchies in the Crucible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20, pp. 710-722.

④ Vlad Oprica, “Gender Equality and Conflicting Attitudes toward Women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9, No. 1, 2008, pp. 29-40.

⑤ Miriam J. Anderson, *Windows of Opportunity: How Women Seize Peace Negotia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heila Meintjes, Meredith Turshen and Anu Pillay, *The Aftermath: Women in Post-Conflic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Zed Books, 2001; Shitrit Ben Lihi, Julia Elad-Strenger and Sivan Hirsch-Hoefler, “Gender Differences in Support For Direct and Indirect Political Agg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Protracte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6, 2017, pp. 733-747.

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于微观机制的讨论和实证研究不足，无法将性别平等与社会—国家层次上的冲突联系结合在一起。^①同时，目前的研究数据大多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跨国研究，^②这又限制了聚焦于单个国家的精细化、国别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调查数据和田野研究的不断推进以及研究者对因果推断兴趣的加深，集中在单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也开始增多。^③一部分研究开始关注亚洲和拉美地区，^④特别是非洲的妇女赋权与冲突的关系。^⑤其中一个新的趋势就是问卷调查和问卷实验方法的兴起。这表明研究的焦点开始从国家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代表着个体层次上研究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探究微观基础和机制提供了条件。例如，德沃拉·曼内金（Devorah Manekin）与里德·伍德（Reed Wood）通过调查实验的方法，研究女性在战争中扮演角色的效果，包括是否有利于增加部队的团结、吸引外部支持以及增强合法性等。^⑥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宏观的国家层次，主要探究的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与此不同，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微观的个体层次，探究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如何影响政府对妇女赋权问题的支持程度。那么，不同于国家宏观层

① Reed Wood and Mark D. Ramirez, "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Gender Equality Peace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 3, 2018, pp. 345-367.

② Aksel Sundström, Pamela Paxton, Yi-Ting Wang and Staffan I Lindberg, "Women's Political Empowerment: A New Global Index, 1900-2012," *World Development*, Vol. 94, June 2017, pp. 321-335.

③ Thomas B. Pepinsky, "The Return of the Single-Country Stud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2019, pp. 187-203.

④ Karen Oppenheim Mason and Herbert L Smith, "Women's Empowerment and Social Context: Results from Five Asian countries," Gender and Development Group, 2003, <http://swaf.pop.upenn.edu/sites/www.pop.upenn.edu/files/WomensEmpowerment2Jan2003.pdf>; Marie E. Berry, *War, Women, and Power: From Violence to Mobilization in Rwanda and Bosnia-Herzegov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Jocelyn Viterna, *Women in War: The Micro-Processes of Mobilization in El Salvad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Annie Jones-Demen, "Dynamics of Gender Relations in War-Time and Post-War Liberia: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in Kenneth Omeje, ed., *War to Peace Transit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pp. 99-120; Aili Mari Tripp, *Women and Power in Post-Conflic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Aili Mari Tripp, "Women's Movements and Constitution Making after Civil Unrest and Conflict in Africa: The Cases of Kenya and Somalia," *Politics & Gender*, Vol. 12, No. 1, 2016, pp. 78-106; 李英桃：《和平进程中的非洲妇女安全——以布隆迪和利比里亚为例》，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6-155页。

⑥ Devorah Manekin and Reed M Wood, "Framing the Narrative: Female Fighters, External Audience Attitudes, and Transnational Support for Armed Rebell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4, No. 9, 2020, pp. 1638-1665.

次的机制，在社会个体层次上，武装冲突对个人关于妇女赋权问题的偏好有何影响呢？

首先，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可能通过塑造和引导社会关于妇女问题的偏好，从而在整体上促进妇女赋权进程。冲突和暴力触发了民众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将暴力的发生归咎于政府，这种责备政府的压力将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从而造成政治危机。这就给政府改革妇女政策提供了一个额外刺激和动力。否则，政府制度本身具备的惯性可能会阻碍政府实行改革。因此，根据这种逻辑，政治暴力有可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促进政府改革，进而扩大妇女权力，提升妇女的地位。此外，根据埃戈尔·拉扎列夫（Egor Lazarev）等学者共同提出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解释，很多人以前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危机发生后，政府的回应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直达选民，从而影响选民的态度；同时，选民得以目睹政府人员的表现，能够有亲身的体验。^①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直接暴露于暴力的情况可以引导个人更多参与政治，尤其是鼓励女性去参与政治和解决这些问题。^②

其次，政治暴力也可能压制和阻碍妇女赋权的进程。以前的研究也提出，类似的危机可以给政府制造“团结一致”（rally around the flag）的效果，增加危机中政府的支持度，“战时总统”带来的支持度和欢迎度有可能会鼓励和支持现任政府采取更加压制的政策来限制妇女权力的提升，从而延缓或者阻碍社会希望推行改革女性权利的努力。比如，凯特琳·韦伯斯特等人提出，在战争和冲突中，军事化就是一个会阻碍妇女赋权的机制。^③爱丽丝·姜（Alice J Kang）和金男奎（Nam Kyu Kim）认为，在美国开展的大量研究都表明，人们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具处理好军事和防务议题的能力，而女性一般更擅长的是教育、健康和减贫议题。因此当暴力袭击发生时，社会上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就会被激化，使得人们

① Egor Lazarev, Anton Sobolev, Irina V Soboleva and Boris Sokolov, “Trial by Fire: A Natural Disaster’s Impact on Support for the Authorities in Rural Russia,” *World Politics*, Vol. 66, No. 4, 2014, pp. 641-668.

② Laia Balcells and Gerard Torrats-Espinosa,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t Attac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5, No. 42, 2018, pp. 10624-10629.

③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更加偏好男性领导人来处理这些暴力问题。^①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妇女赋权就会更加困难。^②

针对这些可能的不同机制，既有研究在微观个体层次上并没有明确回答，尤其是在个人层次上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的一个直接贡献，就是探析武装冲突在个人层次上如何影响社会关于妇女赋权问题的态度，借助自然实验研究设计，评估武装冲突对妇女赋权社会支持基础的因果影响。

三 自然实验研究设计

本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依赖于一种新颖的研究设计——自然实验。本文的两个自然实验来源于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作为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和马里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内战，针对女性的政治暴力也时常发生。^③ 这两个国家都位于西非，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④ 本文选用不同时段的两个国家构建两个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自然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和文章结论的普适性。

（一）案例背景

2009 年以来，尼日利亚开始不断经历“博科圣地”组织的袭击。“博科圣地”于 2002 年在尼日利亚迈杜古里（Maiduguri）创建，以支持伊斯兰教育为目的，并寻求将尼日利亚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2009 年，该组织在迈杜古里对监察

① Alice J Kang and Nam Kyu Kim, “Territorial Threat and Women’s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27, No. 2, 2020, pp. 340-358.

② Daren Fisher and Jacqueline G Lee, “Tes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Gender Equality - Peace Thesis: The Influence of Increased Gender Equality on Terrorism in Turkey,” *Women & Criminal Justice*, Vol. 29, No. 4-5, 2019, pp. 242-265.

③ Therése Pettersson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14,”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2, No. 4, 2015, pp. 536-550;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Once and Future Peacemakers: Continuity of Third-Party Involvement in Civil War Peace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8, No. 2, 2021, pp. 285-311; Cassy Dorff, Max Gallop and Shahryar Minhas, “Networks of Violence: Predicting Conflict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2, No. 2, 2020, pp. 476-493.

④ 关于非洲地区的政治暴力的大数据研究可参考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基于时空模型对非洲政治暴力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8 期，第 94-127 页；陈冲、庞珣：《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 GIS 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载《外交评论》2020 年第 2 期，第 121-154 页。

局和其他政府大楼发动一系列攻击，促使尼日利亚政府对其总部进行突袭，“博科圣地”组织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Mohammed Yusuf）在突袭中丧生。袭击之后，阿布巴卡·穆罕默德·谢考（Abubakar Mohammed Shekau）领导该组织，并从事恐怖主义暴力反叛活动。本文采用的案例来自2012年11月5日尼日利亚政府与“博科圣地”发生的武装冲突。^①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UCDP）记录了这一次袭击。根据美联社和全非洲（AllAfrica）新闻网站的报告，这一起发生在安全部队和“博科圣地”组织成员间的枪战造成了包括当地警察局长在内至少15人丧生。^②这起袭击源自“博科圣地”对4名意大利籍船员的绑架，因此袭击事件很快也成为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军方和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均公开披露和谴责这起袭击事件，引起了本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马里共和国的案例来自于图阿雷格（Tuareg）叛乱组织在2008年12月20日对马里政府控制的一个驻军点的袭击。^③马里实行总统制，总统拥有强大的权力。然而，独立后马里的内乱和叛乱一直不断，政府面临的威胁使得政权的不稳定性增加。1991年、2012年和2020年连续的政变也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在时任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埃（Amadou Toumani Toure）领导下，马里表现出了民主政治方面的特征。^④图阿雷格人是尼日尔北部和马里内陆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游牧柏柏尔人，他们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南部的撒哈拉以南国家和北部的阿拉伯人不同，在整个历史上一直存在低强度的武装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定期与马里政府进行暴力斗争，以增强阿扎瓦德故乡的政治自治权。2008年12月20日的袭击是马里2008年7月签署和平协议以来的第一次袭击，据估计造成20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死亡的是马里军人。这次袭击是由新组建的由易卜拉欣·阿格·巴汉加（Ag Bahanga）领导的变革联盟 ATNMC 实施的。阿格·巴汉

① 附图1显示了这次武装袭击在尼日利亚的地理位置分布（尼日利亚东北部包奇州）。

② “Nigeria - Number of Dead in Yobe State Church Attack Rises to at least 15,” Africa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News, December 25, 2012, <https://africasustainableconservation.com/2012/12/25/nigeria-number-of-dead-in-yobe-state-church-attack-rises-to-at-least-15/>; Segun Awofadeji, “Nigeria: 15 Killed in Potiskum in JTF, Boko Haram Gun Duel,” AllAfrica, December 25, 2012,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212250005.html>.

③ 覃胜勇：《马里：西非新伤疤》，载《南风窗》2013年第3期，第71-73页；贺文萍：《发展与挑战并存：2012年非洲形势回顾》，载《亚非纵横》2013年第1期，第1-9页；韩志斌、高文洋：《图阿雷格人和马里政府冲突型民族政治关系探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65-174页。

④ Susanna Wing, “Briefing Mali: Politics of a Crisis,” *African Affairs*, Vol. 450, 2013, pp. 45-66.

加曾领导多个图阿雷格叛乱组织。这次袭击也是阿格·巴汉加首次在他的家乡基达尔（Kidal）之外进行的一次突袭，图埃总统对此立即作出了回应。尽管这次袭击的对象是军事目标而非普通公民，但依然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二）构建自然实验

准确评估武装冲突对妇女赋权社会基础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在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潜在内生性关系。那些更容易经历（或暴露于武装冲突）的人，也有可能恰好是那些在冲突之后更愿意支持政府扩大妇女权力政策的人。导致内生性关系的因素，既包括社会经济特征，也与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模型估计的关键在于民众经历武装袭击的可能性是否“接近随机”（near-random）。最理想的估计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是随机试验，^①通过随机分配原则，研究者可以排除那些系统地影响进入实验组和控制组因素的干扰，从而仅仅通过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例如比较不同组均值的差异，便可以得出因果关系。

然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冲突研究中，随机试验是很难开展的，不仅成本高，而且无法人为地将对象随机分配在武装冲突中（或制造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自然实验或者准实验（quasi-experiment）作为一种可行的研究设计方案，得到了社会科学的青睐。其核心是利用自然产生或者意外发生的事件来创造接近随机分配的机制，将研究对象分配在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而通过控制和处理一些潜在干扰因素，可以较为准确地接近随机分配性，提供统计估计因果关系的可能。^②近年来，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在国际关系中也得到了关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③如塞巴斯蒂安·琼昆兹（Sebastian Jungkuz）、马克·赫尔布林

^① Thad Dunning, *Natural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Design-Based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Thad Dunning, “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Natural Experimen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08, pp. 282-293; Thad Dunning, *Natural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Design-Based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James H Stock and Mark W Watson,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Third edition), London: Pearson, 2015; Peter M Aronow and Cyrus Samii, “Does Regression Produce Representative Estimates of Causal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0, No. 1, 2016, pp. 250-267; Jeong Hyun Kim, “Direct Democracy and Women’s Political Engag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3, 2019, pp. 594-610.

(Marc Helbling) 和卡斯滕·施韦默 (Carsten Schwemmer) 以2015年巴黎恐袭事件为样本, 创建自然实验来估计仇外情绪。^① 这些研究往往集中在单一国家, 也反映出近年来学界回归单一国家案例, 进行精细研究揭示因果关系的趋势。^②

如前所述, 马里共和国和尼日利亚的武装袭击分别发生在2008年12月20日和2012年11月5日。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 正在马里共和国全国范围内开展第四轮问卷期间 (2008年12月15日~2008年12月31日), 马里正巧在2008年12月15日发生了一起武装袭击。同样地, 非洲晴雨表在尼日利亚开展第五轮问卷期间 (2012年10月30日~2012年11月18日), 2012年11月5日, 当地发生了一起“博科圣地”对政府军的袭击。由于这两起袭击事件的发生不太可能受到非洲晴雨表调查日程的影响, 我们可以认为, 参与问卷的受访人员与是否经历武装袭击冲击 (shock) 的概率是相互独立的, 即哪些人进入控制组或实验组的分配机制是接近随机的。由于非洲晴雨表已经收集了这段时间的问卷, 我们就可以将参与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分为袭击前和袭击后, 将武装袭击带来的冲击视为一种“干预” (treatment), 这样就产生了随机分配的实验组和控制组, 从而创建了一个自然实验。^③ 在袭击发生前完成问卷调查的居民可以被视为控制组, 即没有暴露在武装袭击的冲击下; 而在袭击之后参与问卷的受访者则是暴露在武装袭击的冲击之下, 被视为干预组。

本文的因果识别策略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在于利用自然实验设计来估计武装冲突后民众对于妇女赋权政策的支持, 而对该因果效应的检验可以通过如下回归模型完成:

$$y_i = \beta_0 + \beta_1 T_i + \gamma Z_i + \varepsilon_i$$

其中 y_i 是因变量, T 是一个哑变量, 如果受访者是在武装袭击之后完成问卷 (即实验组), 则取值为1; 反之取值为0 (控制组) ——意味着他们在袭击之前就

① Sebastian Jungkunz, Marc Helbling and Carsten Schwemmer, “Xenophobia before and after the Paris 2015 Attack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Ethnicities*, Vol. 19, No. 2, 2019, pp. 271-291.

② Thomas B Pepinsky, “The Return of the Single-Country Stud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2019, pp. 187-203.

③ Laia Balcells and Gerard Torrats-Espinosa,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t Attac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5, No. 42, 2018, pp. 10624-10629.

已经完成了问卷。 β_1 就是本文感兴趣的武装袭击对因变量的因果影响。 Z 是一组控制变量， ε 是残差项。根据自然实验对于“干预”的分配机制接近随机的要求，需要假定上述模型中， T 与残差项 ε 是相互独立的，即 $\text{cov}(T, \varepsilon)=0$ ，以确保对于是否进入控制组和实验组不存在偏差，而是接近随机分配的。在现实中，这一条件几乎难以完全满足，因此研究者将假定是“接近随机”，即将武装袭击的发生视为有条件地独立（conditional independence）于受访者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会系统地影响估计偏差。然后，通过观察和调整随机分配与实验组对象特征的不平衡（imbalances），以避免其对武装袭击效果的估计产生干扰。^①通过平衡性测试，我们可以检验“有条件性独立”这一假定是否满足；如果满足，那么意味着武装袭击是外生于（exogenous）那些可能影响随机分配干预的因素的。

（三）平衡性检验

实证分析的第一部分是检查干预（武装袭击）随机分配的有效程度。为此，我们比较了控制组与实验组成员的一些关键可观察特征的平均值是否存在显著的不同。本文采取了两种平衡性检验方法。第一种T-检验（T-test）基本表明两组的平均值是否相等：分配给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受访者没有系统性差别。在确认了基本方法论假设的可靠性之后，转向Logit模型检验。该过程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我们将因变量回归到自变量上，从而比较受访者进入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概率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差别；若没有变量显著地影响进入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概率，我们则可以基本断定两组的平衡性条件满足。由于我们的分析单位是个体，而问卷则在不同行政区域内进行了随机分配，因此我们采用稳健的聚类标准误差（robust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根据行政区域对标准差进行聚类。

建立在既有研究的分析策略基础上，^②本文从非洲晴雨表第四轮和第五轮问

^① Luke Keele and William Minozzi, “How Much Is Minnesota Like Wisconsin? Assumption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Causal Inference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1, No. 2, 2013, pp. 193-216.

^② 类似的研究可以参考 Allison Carnegie and Nikolay Marinov, “Foreign Aid,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1, No. 3, 2017, pp. 671-683; Jasper Cooper, Sung Eun Kim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The Broad Impact of a Narrow Conflict: How Natural Resource Windfalls Shape Policy and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0, No. 2, 2018, pp. 630-646; Adrián Lucardi, “The Effect of District Magnitude on Elector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wo Natural Experiments in Argent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2, 2019, pp. 557-577.

卷中挑出了一系列可能对随机分配性造成影响的因素。这些变量涉及受访者自身的社会经济和家庭特征。它们有可能会影响受访者是否接近随机地暴露于武装袭击的冲击下。例如，有学者认为，非洲晴雨表可能无意中抽取了更多城市居民而非农村居民，而鉴于填报问卷本身获得的物质性奖励，农村或贫困的居民在袭击发生之后更有可能接受问卷调查，也更有可能将自身的弱势地位产生的怨恨归咎于政府，从而更不太可能支持现任政府的对性别平等的政策。鉴于此，可以建立一个哑变量——“城市受访者”来测量是否存在这种潜在影响实验组分配的干扰因素。如果受访者居住在城市赋值为1，否则为0。我们检验了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和受访者的年龄是否存在平衡性的问题。根据调查问卷，重新设计哑变量，将受访者完成小学或小学以上教育视为有接受正式教育，并赋值为1，否则为0。受访者的年龄采取其在问卷中的自报年龄。同样，性别也有可能影响受访者是否被非随机地选入实验组。根据问卷问题，建立“女性受访者”这一哑变量，如果是女性，赋值为1；否则为0（男性）。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随机性。在问卷中一般很难直接询问受访者的收入具体数额，因此研究者使用间接办法，根据一些相似的问题进行代理测量。我们根据问卷问题中关于在过去一年中受访者或者其任何家庭成员是否有足够的食物这一变量，表示“受访者贫困状态”。

同样，根据问卷中对于受访者拥有的物质物品测量受访者财产所有状况。利用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包括询问受访者是否拥有收音机、电视机、汽车（或摩托车）这三个问题，建立“受访者财产所有”这一哑变量，即当受访者拥有收音机、电视机、汽车（或摩托车）中任何一件物品时，赋值为1，否则为0。我们根据受访者是否“收听收音机新闻”来测量受访者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也是一个哑变量。民族问题在非洲是一个显著影响指标，因此，根据受访者自报的民族归属来测量其是否与总统属于相同民族，即“受访者与总统相同民族”这一哑变量。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埃伯勒·乔纳森（Dr Goodluck Jonathan）来自于尼日尔河三角洲一个少数民族伊贾（Ijaw）族。^①与尼日利亚总统不同，马里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埃是颇尔/福福德文族群（Peulh/Fulfulde），该族大约占据15%的全国人口。另一个主要指标为是否是国内的主导民族（dominant group）。在尼日利亚，如果来自于伊博（Igbo South-East）或者豪萨（Hausa）则赋值为1，

^①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 Nigeria,”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954ce6719.html>.

否则为0。对于马里共和国，这一个哑变量主要测量受访者是否为班巴拉（Bambara）族，因为这一民族占总人口的33.3%。^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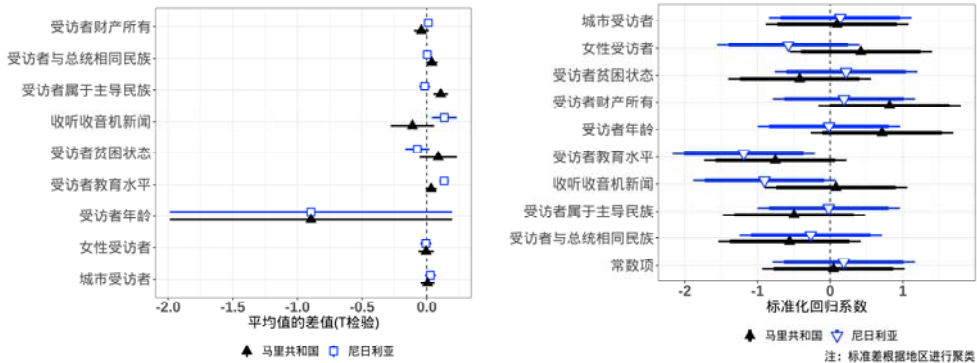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平衡性检测结果

注：三角形代表马里样本；正方形代表尼日利亚样本。左图平均值差异 T 检验；右图 Logit 回归模型检验。线条代表 95%的置信区间。

关于平衡性的测试，首先报告T-检验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同变量的平均值差异。图1（左）展示了基于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样本的T-检验结果。图中的点估计表示T-检验的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对于大部分的变量，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并没有显著不同。在尼日利亚样本中，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不平衡，从未完成小学教育与完成小学教育以上的受访者人数分别为504人和1 860人。这意味着在袭击之后参与问卷的受访者教育水平明显更高，可能会影响后面观察到的对于妇女赋权支持的变化。与此相反的是，在马里共和国的样本中，教育水平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另一组存在显著差别的变量是尼日利亚样本中通过收音机获取新闻以及马里共和国样本中的年龄。

T 检验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尤其是无法控制其他变量。另一种方式是选择回归模型来更系统地揭示这些特征是否导致受访者系统地、更有可能（不可能）进

① 种族人口分布包括班巴拉（Bambara）33.3%、富拉尼（Fulani）13.3%、萨拉科勒（Sarakole）9.8%、塞努福（Senufo）9.6%、马林克（Malinke）8.8%、多贡（Dogon）8.7%、松海（Songhai）5.9%、博博（Bobo）2.1%、图阿雷格/贝拉（Tuareg/Bella）1.7%、其他马里（other Malian）6%、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公民 0.4%、其他 0.3%（2018 年估计）。参考《马里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20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140/。

入实验组和控制组。^① 因此，利用 Logit 模型，根据地区/省份来将回归系数的标准差聚类，以处理区域内的受访者可能存在的不相互独立性问题。在 Logit 模型中，我们将武装袭击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自变量。图 1（右）显示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样本的平衡性测验。统计结果表明，在 T-检验中发现的存在均值显著不同的大部分变量，都不再继续显著地影响是否进入实验组。图 2 中，只有尼日利亚样本中的教育水平在 95% 水平上存在显著，而其余变量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都不显著。平衡性检查总体上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变量都不显著影响是否接近随机分配这一原则，并提醒我们对于尼日利亚样本中的教育水平在回归分析时可能需要注意并调整潜在的影响，即是否存在“条件效应”（conditioning effect），因此在随后的模型估计中需要加以控制。

本文用来测量微观层次上社会民众对妇女赋权支持的变量，来自于问卷中关于政府处理妇女赋权议题的赞同程度。具体而言，在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到，“你认为现任政府在处理妇女赋权议题上的表现如何”。本文将答案进行处理，包括四个层次“非常差”“比较差”“比较好”以及“非常好”。因此，该因变量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ordinal categorical variable），测量了受访者对现任政府妇女赋权政策的支持程度。^②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就是是否暴露于武装袭击的冲击（0 或 1）。鉴于因变量 Y 的实际取值为有序分类变量，因此本文的主要统计模型为定序 Logit 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定序 Logit 模型是对非线性模型 Logit 的延伸，可以估计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处于不同层次的概率，特别适合本文所关注的有序分类变量。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基于 $k-1$ （ k 为变量的总类别数量，在本文 $k=4$ ）系数，对 k 个不同结果的相对可能性进行建模。模型中的 $k-1$ 系数捕获了落入扩展的有序类别集。例如，在四种可能的结果类别下，模型的三个截距（每个截距将至少与前一个截距一样高）相对于基准（baseline）观测几率的对数（log odds）。为了厘清“实验干预”效果，本文也控制了上文进行平衡性检查的几个其他变量。

^① Gregory Robinson, John E. McNulty and Jonathan S. Krasno, “Observing the Counterfactual?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Experiments in Nature,”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7, No. 4, 2009, pp. 341-357.

^② 附图 2 展示了在问卷期间内，受访者每天选择答案的频次分布，其中垂直线分别表示武装袭击的日期。总体上，袭击之前和袭击之后的样本数量也较为平衡。

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通过以上自然研究设计思路，本文得出了以下统计结果，并对其稳健性和机制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 主要发现

首先，分别以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为更好地展示回归效果，本文的结果以回归系数图（coefficient plot）展示。图 2 分别展示了以尼日利亚为样本和以马里共和国为样本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图 2 主要采用了两个模型，其中第一个模型没有考虑各地区（region）的差异（用三角形表示），而第二个模型使用固定效应（用正方形表示），考虑了模型在地区层次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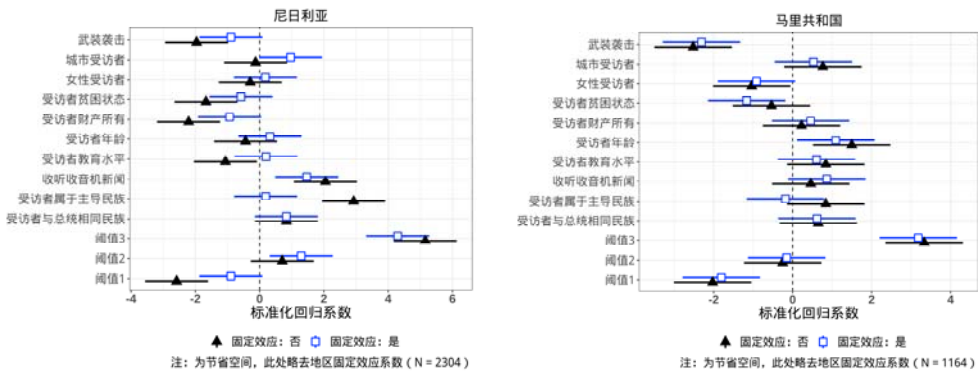


图 2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注：区间代表 95%置信区间。左图为尼日利亚样本；右图为马里共和国样本。

图 2（左）的结果显示，武装袭击这一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是统计显著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在武装袭击之后的受访者更不太可能支持和认可现任政府处理妇女赋权问题的政策。这说明，当国内武装袭击发生后，民众对于现任政府如何处理妇女赋权政策的支持会立马下降。民众对于政府改变现行政策的期望则会增加，从而可能对政府产生一种社会压力。这种短期内的压力就有可能促成政府去回应和改革现有的妇女赋权政策，从而在武装袭击之后为妇女赋权带来新的希望。这一发现，在个人层次上更加明确了武装冲突是如何为妇女赋权提供可能和机会的，弥补了既有研究仅仅关注国家层次结果的不

足，从而提供了一条从微观到宏观的因果机制。

同样地，图 2（右）展示了以马里共和国为样本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发现了相同的效果，即武装袭击这一变量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且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因此，尼日利亚和马里的发现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另外，图 2 中的控制变量也展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在尼日利亚样本中通过收音机接收新闻的人明显更容易支持政府的妇女赋权政策——可能是他们拥有更好的信息接受能力，因而在袭击发生之后更能够接受政府的宣传。其次，与总统民族相同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政府。与此相反，这两个发现在马里共和国的样本中均不显著，取而代之的是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另外，女性更不太可能支持政府的政策，而年长者更支持现任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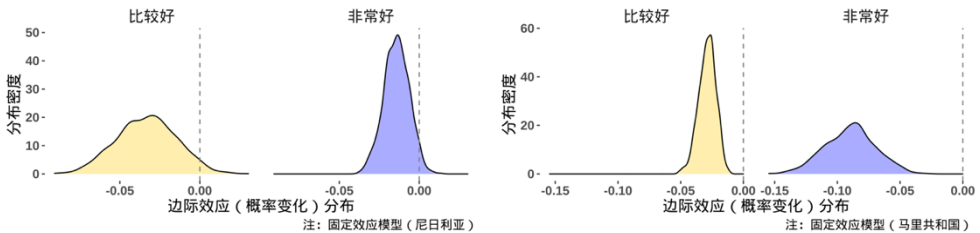


图 3 武装袭击对妇女赋权支持的边际效应影响

注：垂直虚线 X=0。概率密度变化分布在 X=0 两侧代表统计显著性。密度分布由 1 000 次模拟计算得出。

为更好地解释武装袭击的实质影响 (substantive impacts)，本文计算了这一变量的边际效应 (预测概率的变化)。运用一种新颖的模拟方法，^① 计算受访者在袭击前后对于认可政府政策“比较好”和“非常好”的概率变化，用公式表示为： $\Pr(\text{好}|\text{袭击 } T=1, Z) - \Pr(\text{好}|\text{袭击 } T=0, Z)$ ，其中 Z 为其他控制变量，T 为干预变量。在这一种模拟过程中，我们将除干预变量 (武装袭击) 之外的所有其他变量取其在样本中的真实值，每一次模拟分别计算干预变量对于“比较好”和“非常好”的概率变化。经过 1 000 次模拟，我们得到了这一变量的边际效应的密度分布。这一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明显克服非线性模型的错误设置。传统计算边际效应

^① Michael J Hanmer and Kerem Ozan Kalkan, “Behind the Curve: Clarifying the Best Approach to Calculating Predicted Probabilities and Marginal Effects from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7, No. 1, 2013, pp. 263-277.

的办法是让其他变量取中位数或均值，建立一个“平均案例”，实际上只是一次随机抽样，并且这样的平均案例往往也不存在。但是本文的方法却是根据模型估计后的参数，进行 1 000 次随机抽样，因此可以更好地捕捉模型估计的不确定性。估计出的边际效应分布也可以作为总体中“干预效果”的平均分布。^①

图 3 展示了针对尼日利亚和马里两个样本、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的边际效应变化分布。图 3 表明，在 1 000 次模型中，绝大部分的平均边际效应的分布都在 $X=0$ 这条直线的左边，表明实验组的概率变化比控制组的概率变化更低。例如，图 3 左图表明，相比于袭击之前填写问卷的受访者而言，在袭击之后的受访者认可政府现行妇女政策属于“比较好”和“非常好”的概率都下降了。这进一步说明，武装袭击对于降低民众支持政府妇女赋权政策，确实具有统计上的因果效应。图 3（右）展示以马里共和国为样本、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的边际效应变化。图 3（右）表明，相比于袭击之前填写问卷的受访者而言，在袭击之后的受访者认可政府处理妇女赋权问题是“比较好”和“非常好”的概率都下降了。

（二）稳健性检验与机制讨论

上述定序 Logit 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了武装冲突对于社会支持妇女赋权影响的显著因果效应。本文对统计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确保所发现结果具有稳健性。

第一，本文使用了混合效应多层 Logistic 回归模型作为替代模型。我们首先分别估计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的样本，然后将二者合并进行分析。图 4（左）展示了基于多层 Logistic 回归模型（multilevel ordered logistic models）的结果（即混合效应多层 Logistic 回归模型）。^②图 4（左）中，圆点代表的模型是尼日利亚样本，三角形代表的模型是马里共和国样本，而正方形代表的模型则是合并两者的样本。在前两个模型中采取了两层（two-level）混合效应，而第三个模型则加入了三层（受访者、区域和国家）。武装袭击这一变量在所有的模型都在 95% 的置信区间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与上文的统计结果一致。

①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② Andrew Gelman and Jennifer Hill, *Data analysis Using Regression and Multilevel/Hierarchical Mode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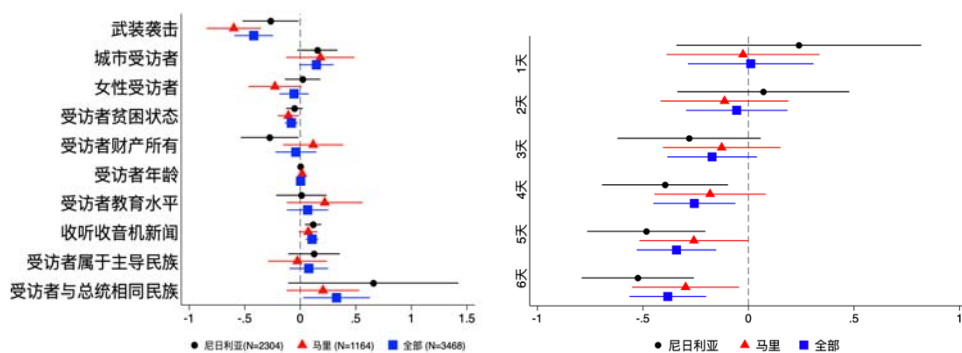


图4 多层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注：区间代表 95%的置信区间。左图系多层 Logistic 回归系数；右图系武装袭击对妇女赋权支持的时间效应。

第二，本文尝试采取其他替代的因变量重新运行回归模型。由于非洲晴雨表主要是从第五轮（尼日利亚案例）开始采纳关于妇女问题（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问卷，目前本文所依赖的数据无法找到除本文因变量之外的第二个同时在第四轮和第五轮问卷中都存在的关于妇女赋权问题的变量。为此，本文尝试利用尼日利亚样本中的另外两个问题：（1）据你认为在本国妇女被传统领导不公平对待有多频繁；（2）据你认为在本国妇女被她们的雇主不公平对待有多频繁。两个问题对应的回答是“从未”“很少”“经常”和“总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两个问题与正文的因变量有所不同，正文中的因变量是民众对政府处理妇女问题表现的感知，而这两个问题是民众对本国是否存在性别不平等的感知。利用相同的模型设定，以此两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因变量，本文重新运行了统计模型，结果见附图 3。统计结果表明，武装袭击显著地增加了民众对本国妇女在生活和工作遭遇歧视（不公正对待）的感知概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回归系数符号与上述正文相反，因此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武装冲突增加了民众对本国政府处理妇女赋权问题的不满，因为民众在武装袭击之后更有可能相信妇女遭受不公正对待的频率在增加。

第三，本文只考虑了袭击地区的样本。在马里，武装袭击的地区是塞古地区（Segou region），在尼日利亚则是包奇州（Bauchi State）。分析发现，在马里样本中，武装袭击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在常规统计置信区间并不显著。在尼日利亚，袭击发生的包奇州，问卷是在袭击之前已经完成了。因此，我们选择了毗邻的约贝州（Yobe State）。由于约贝州的问卷都是在袭击之后完成的，如果将其与

包奇州合并估计，那么约贝州正好可以视为一个关于包奇州的“合成案例”，^①即约贝州和包奇州的直接比较可以作为一组反事实。统计结果显示，武装袭击以这两个地区作为样本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为负数。

第四，本文尝试了潜在的交互效应，包括武装袭击的效果可能在受访者的性别、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不同。但是统计结果表明，交互效应并不存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武装袭击对于群众对政府处理妇女赋权问题的支持下降这一因果效果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这更进一步凸显了武装袭击对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塑造性作用。

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上文所发现的武装袭击可以显著增加冲突之后民众对政府处理妇女问题的不满，这一因果效应是比较稳健和连贯的。那么民众对政府处理妇女问题的不满是否影响后续有关性别权力平等的改革政策呢？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武装袭击产生的对政府处理妇女问题不满的显著效应能够持续多久；二是社会的普遍不满能否成为真正推动妇女赋权运动的导火索，进而直接促成可以提高妇女赋权的相关政策改革。

首先，本文发现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支持妇女赋权影响的持续效应是比较短期的。与既有研究一样，^②本文也选择不同的观察窗口，分别比较在袭击前后 1 天、2 天、3 天、4 天、5 天和 6 天内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不同影响。图 4（右）展示了 18 个不同模型中，武装袭击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和 95% 的置信区间。由于不同的观察窗口意味着不同的样本量，因此如果只比较袭击前后 1 天，样本量是最少的，这样也意味着模型估计的系数的不确定性越大。图 4（右）表明，只比较袭击前后 1 天与 2 天的支持，武装袭击并不显著。但是从比较武装袭击前后 3 天开始，随着样本量增加，模型估计的不确定性也在减少，而武装袭击的回归系数也逐渐和前文保持一致。这表明，随着袭击发生后，新闻消息的传播，武装袭击对关于妇女赋权支持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也开始显现。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对社会民众关于妇女赋权支持态度的影响的时间效应。

尽管如此，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分析样本来源于问卷数据，这里估计的时间

^① 关于合成分析的讨论可以参考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32-155页。

^② Laia Balcells and Gerard Torrats-Espinosa,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t Attac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5, No. 42, 2018, pp. 10624-10629.

效应依然是短期效应。冲突虽然可以为战后妇女赋权提供机会，但是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并不必然会得到保障，妇女赋权的进程也不会自动发生，仍需要妇女积极参与到安全与和平建设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会发生，并且在此过程中甚至可能出现反复。^①例如，2009年马里国民议会修改了1962年通过的《家庭法》（*Code de la Famille*），^②以试图扩大妇女赋权、增加性别平等。该法案遭到了时任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埃的否决，而2011年通过的新法案在压制妇女权利上甚至比1962年的《家庭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社会政治团体、政界精英、议会中的女性议员以及新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等的广泛支持下，马里国民议会在2015年11月12日通过了一项性别限额（gender quote）法案，规定选举或被任命的官员中妇女的比例至少需要达到30%。^③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表明，武装袭击之后普遍增加的对政府处理妇女问题的不满将会导致马里和尼日利亚在短期内去改善妇女地位和性别权力的不平等。事实上，根据“多样性民主”（V-Dem）项目的数据统计，这两国在妇女政治赋权（political empowerment）与妇女民权（civil liberties）平等上的提升一直比较缓慢（见附图4），两国在2000年至2018年间，政治权力按性别分配的这两个指标一直没有变化，而只有马里共和国在性别民权平等指数上存在上升情况。

其次，关于冲突之后民众对政府关于妇女问题的不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换为大规模的社会妇女运动，进而演变为女权改革的推动力这一问题，虽然在本文的数据分析中或者说本文选择的两个案例中无法得到直接的检验，但是既有研究一般都发现，对政府如何应对妇女问题的不满以及对妇女状况与权力地位恶化的感知是推动妇女运动的必要条件。^④结合上述稳健性检验中关于武装冲突增加了民众对本国妇女在工作和生活中被不公正对待的频率感知的发现，可以推测在武装

①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② 1962年的《家庭法》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传统主导地位。

③ Benjamin F. Soares, “The Attempt to Reform Family Law in Mali,”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49, No. 3/4, 2009, pp. 398-428. 相关论述可参考“Mali Adopts Law Promoting Gender Equity,” <https://www.ndi.org/mali-adopts-gender-quota-law>.

④ Aili Mari Tripp, “Women’s Movements and Constitution Making after Civil Unrest and Conflict in Africa: The Cases of Kenya and Somalia,” *Politics & Gender*, Vol. 12, No. 1, 2016, pp. 78-106.

袭击后，形成提升妇女赋权的大规模社会压力（包括国际压力），使得政府面对和回应妇女问题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这也是将来把妇女纳入安全、和平议题和提升妇女政治参与的社会支持基础。例如，经历 1994 年种族屠杀的卢旺达在 2003 年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中规定，下议院（众议院）中的 80 个议席中需有 24 个保留给女性，而上议院（参议院）中至少 30% 的参议员必须是女性。^① 根据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的统计，到 2019 年 2 月，卢旺达成为全世界女性议员比例最高的国家，其下议院 61.3% 的议员为女性议员。^② 在马里和尼日利亚，由于大部分民众并不认为妇女问题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③ 可以预期类似卢旺达一样的妇女参政比例增加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实现。尽管如此，本文所发现的对政府关于妇女赋权议题的不满以及对妇女权力地位的恶化认知，是建立“武装袭击——民众不满——社会动员——政府或政策变革”这一因果链条的微观基础上的第一环，实现从社会动员到政策的变革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条件和触发因素。

那么，武装冲突显著增加民众对现任政府处理妇女赋权问题的不满是否是民众对政府整体性不满的一个具体表现，或者说整体性不满的一个外溢结果呢？鉴于两个案例中，民众认为妇女问题并非政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此，本文利用另两个关于民众对现任政府态度的问题（“现任政府在管理经济上的表现如何”以及“现任政府在提高穷人的生活标准上的表现如何”）重新运行定序 Logistic 模型，统计结果见附图 5。结果证实了这种可能，即武装冲突增加了民众对这两个维度的不满。这也表明武装冲突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妇女问题并非只是唯一被影响的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发现并非是在否定本文的研究结论。相反，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武装冲突对社会变革影响的最初动力可能来自民众在冲突之后对现任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成为未来社会运动与动员的来源之一。即便妇女问题在当时并非主要任务，对政府整体不满产生的外溢效应依然可以成为推动妇女赋权改革的动力，因此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Rwanda*, <http://www.jurisafrica.org/docs/constitutions/THE%20CONSTITUTION%20OF%20THE%20REPUBLIC%20OF%20RWANDA.pdf>.

② 马里和尼日利亚下议院女性的比例分别为 8.8% 和 5.6%，参见“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席位为 2019 年 2 月 1 日情况，<http://archive.ipu.org/wmn-e/arc/classif010219.htm>。

③ 对问卷中的“民众认为本国政府应该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尼日利亚和马里民众选择妇女问题的比例分别为 0.2% 和 2.3%。

五 结论

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如何影响妇女赋权？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的研究问题。本文超越传统从国家和国内政治层次的分析，专注于微观层次上的个人分析，为微观机制的厘清提出了新的视角和证据。实验研究方法一直被诟于其较低的外部效度，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较少运用。本文的两项自然实验均发现了武装冲突对于政府应对妇女赋权表现的不满，从而在微观机制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这一研究发现具有因果效应，超越了单纯的仅仅具有相关性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为将来进行微观层面的冲突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第一，本文在微观层面对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如何影响政府处理妇女赋权问题的社会支持基础进行了因果分析，这为厘清“性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解释和证据。

第二，本文的研究设计和思路可以轻易地拓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和国家，为进一步研究其他政治事件的因果影响提供一个借鉴。界定因果关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囿于观测数据本身的局限以及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过分注重国际层次因素的局限，微观层次上的因果证据一直欠缺。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为下一步连接宏观与微观解释的对话提供了基础。

第三，利用自然实验思路，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开拓新议题提供了基础。例如，研究者可以系统全面地运用自然实验这一方法研究政治暴力与妇女赋权的关系。研究者可以利用乌普萨拉大学的冲突数据库（UCDP）中的武装冲突数据，或者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甚至战争相关数据项目（COW）等数据事件的时间信息，设计更大规模的自然实验研究。研究者还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将有关政治暴力在地方上的影响进行比较。同时，研究者也可以进一步区分冲突的类型。一般而言，国际冲突更具破坏力，而本文属于国内冲突范畴，比较二者在微观层次上的差异影响同样重要。最后，本文关注的是短期和即时的影响，如何将个人层次的分析与暴力长期影响结合起来，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方向。这些都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来稿日期：2020-10-08】

【修回日期：2021-02-25】

【责任编辑：谢磊】